



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3

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决定通过时,人民大会堂会场内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是继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后,国家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又一重大举措。

决定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会议认为,香港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制度,包括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确保爱国爱港者治港,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决定共9条。

决定明确,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必须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宪制秩序,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切实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选举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等五个界别共1500名委员组成。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选出,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不少于188名委员联合提名,且上述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选举委员会以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90人,通过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分别选举产生。

决定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健全和完善有关资格审查制度机制,确保候选人资格符合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的解释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的规定。

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依照本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

决定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安排和选举组织等有关重要情况,及时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今年记者会,总理回答了这些热点问题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的邀请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李总理,新冠肺炎疫情对许多工作完成的方式和地点都产生了影响,疫情暴发一年了,请问中国就业质量和收入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中方将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改善这种状况?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消费需求特别是国外品牌消费有什么影响?

李克强:就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去年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很多街面上都见不到行人了,多数店铺都关了,当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记得后来我到地方考察,看了不少店铺。在一个小店,店主跟我说,3个月没有营业了,因为政府减免税费,支持减免房租、水电费、稳岗补贴资金到位,我们没有裁员,挺过来了。我问员工的工资怎么办?他说当时只发生活费了。在场的20多位员工都说,店里管吃管住,不让我们下岗,还有什么说的。企业和员工都明白,只要保住了企业、稳住了岗位,一复工复市,生意就会旺起来。

去年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有制定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但是反复权衡,还是制定了就业目标,也就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也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当时我们也提出,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实际上相信只要能够实现9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就有经济的正增长,因为有就业就有收入,就可以带动消费、拉动经济。

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上下共同努力,我们的市场主体表现出坚强的韧性,广大人民共克时艰,最后实现了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全年经济增长2.3%,居民收入相应增长,都好于预期。

今年我们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还要为两亿八千万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依然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我们继续推动“六稳”、落实“六保”,还是把就业放在首位。去年出台的有关就业的政策举措,不仅没有调退,还有所增加,其他政策都要有利于就业。我们相信,通过经济稳定恢复增长,会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而更多的就业岗位会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今年我们确定新增城镇就业的目标是1100万人以上,希望在实际执行中还可以更高一点。我们也很明确,就业还是要让市场来唱主角,也就是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一方面推动稳岗增岗,另一方面拓展就业渠道。去年疫情中就业方式也有新变化,像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新动能,包括网购、快递等逆势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就业和传统产业发展。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增加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也要广开灵活就业的渠道。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有的一人打几份工,很辛苦,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这也有利于灵活就业市场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至于刚才记者朋友提到的老年人问题,中国老龄人口已经有两

亿六千万,老龄产业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它带来了多样化的需求。正因为中国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这样一个广大的市场也必然会给外国企业的产品、服务乃至投资创造更多机会,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

中国有14亿人口,劳动力资源可以说是最丰富的资源,中国人民又能够吃苦耐劳,只要有就业门路就会多挣。“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我相信中国人民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来逐步迈向共同富裕。

西班牙埃菲社记者:美方指责中方对上月到访武汉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缺乏透明度,专家组组长指出中方同事分享了大量工作细节,同时也表示专家组希望获得在2019年10月至12月之间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似疾病病例的更多原始数据,中方是否愿提供这些数据,或者是否愿再次接待专家组访华?

李克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方和各方一样都希望能够尽快查清病毒是从哪里来的,这样有利于切断传播的渠道,更好更有效地来防控疫情。但疫情溯源的确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持续研究。中方本着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开放合作的原则和态度,同世卫组织保持沟通,也支持世卫组织专家在华开展溯源研究工作。下一步我们还愿意继续同世卫组织一道,推动科学溯源工作。

当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当务之急不仅要溯源,还要做好各种防控工作,包括接种疫苗等。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希望各方携起手来,因为这样一个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们也坚信人类有能力最终战胜这个病魔,我也希望明年我们能够面对面进行交流。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您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6%以上,目前很多国际机构都认为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8%左右。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除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大,还存在着由于世界性的资金过剩导致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风险,现在中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请问总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是否存在宏观政策转为偏紧的可能性?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于2028年超过美国,对此您有何看法?

李克强:我注意到,我们提出6%以上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实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有不少分析。

有的认为是积极的,也有的认为低于预期。我们当然乐见经济向好,但是也清醒地看到,今年是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前行,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而且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依然很大。我们说增长6%以上,6%不低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100万亿元,增长6%就是6万亿元,这要放到“十三五”之初,需要8%以上增速才能达到。而且我们说增长6%以上是开了口子的,实际过程中也可能会增长得更高一点。但是我们不是在定计划,是引导预期,希望把预期引导到巩固经济恢复增长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可持续性,尤其是和明年、后年的目标相衔接,不能造成大起大落,否则会扰乱市场的预期。一时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稳,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有力。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经济能行稳致远,保持长期向好。

去年面对罕见的巨大冲击,我们及时果断采取措施,但也保持定力,没有搞“大水漫灌”。我们新增财政资金规模2万亿元,绝大部分都是用于市场主体和民生急需,主要是减税降费、保基本民生,而且采取了直达机制,就是把

这些“救命钱”最快7天时间直达基层,来保证基层减税降费、稳岗等财力,很快就见到效果。如果我们当时重点考虑上大项目、搞大产业,这不是不需要,但这要经过论证还要考虑市场需求,时间恐怕得200天以上,就不是仅仅一周时间了。错过了时间,企业可能会大批倒闭。我记得去年在记者会上,也有记者提出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规模和力度是不是偏小了。我们是把“肥”施到根子上,政策打到点子上,所以起效快、有作用。现在看,这个规模、力度是合理的,准备的储备政策后来也没有用。

去年我们没有搞宽松政策,或者说所谓量化宽松,今年也就没有必要“急转弯”,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着力稳固经济,推动向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是要注重把“肥”施在根上,现在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还在恢复元气中。由于经济恢复增长,我们要合理调整政策,但调整是适度的,有些阶段性政策退了,同时又用一些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来冲抵影响,保持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力度不减。

怎样保持力度不减?资金规模固然很重要,但用好钱更重要,我们去年宏观调控积累的经验还可以继续用。比如在财政金融方面,简单地说,就是要“一减、一增、一稳中有降”。“一减”,就是减少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各级政府都要带头过紧日子;“一增”,就是扩大直达资金范围,让基层和市场主体感到政策支持力度不减,这样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惠企利民;“一稳中有降”,就是在稳定杠杆率的同时,引导金融企业合理让利,使中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当然,我们对各类风险隐患,也会及时防范化解。

(下转15版)